

清华的记忆像校花紫荆

○ 陈舜瑶（1936 入学，土木）



1990 年陈舜瑶学长参加级庆留影。前排左起：徐元冬、陈舜瑶、谢文（徐夫人）；后排左起：李舜英、丁永龄、周元青

我 1936 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就读于长沙临时大学，年底离校北上，辗转去延安学习。随后分配在中共领导下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和南京中共代表团工作。直到解放战争打响，才回到东北解放区，从事青年运动和教育工作。1953 年初，重返母校工作整整八年。1961 年又调到西北，主要做宣传文教工作。几经曲折，1981 年又调回北京，做政策研究工作，不久以年老从第一线退下来。这就是我离开清华后半个多世纪的简单经历。

我在清华仅仅三个学期，却影响了我一生。回想初入学时，也曾梦想灾难深重的祖国有朝一日能够站起来，我愿为建国而努力。为此，我渴望学点建国真本领。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中华民族

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痛感救亡是最急迫任务，就和许多同学一起，投身到清华园里如火如荼的救亡活动中。我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深情，参加各种报告会、时事讨论会，热烈讨论时局动向和国家前途。我们曾在灯火通明的教室里为绥远抗日将士赶缝棉背心。我们组织了海燕歌咏团，要学暴风雨前的海燕，呼唤抗日，大礼堂常传出《松花江上》和《五月的鲜花》的歌声。我们为了锻炼自己，曾聚集在西山无梁殿，半夜爬上鬼见愁，坐在峰顶等待破晓。我也曾骑自行车沿着乡间小路去妇女识字班教课，使我这在城市生长的学生初次接触到农村。这段生活启迪我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重返母校，再同当年师长、校友、教师、职工、同学一起，实现我当年梦想，以满腔爱国热情，学习建设祖国的知识。改建的水工实验室里回响着新一代同学自己谱写的建设祖国的豪迈歌声，水利系师生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亲自参加修筑密云水库，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很多同学被安排到重点工厂实习，有机会接触国内最新技术。每当我陪内宾、外宾参观程控机床表演时（1958 年这还是新鲜事物），不禁想起当年我们金工实习时工厂里的皮带车床和电钻。新中国塑造了新清华，新清华又蕴藏着老清华的爱国传统和优良

学风，虽然从1961年起我离开清华已快三十年了，现在清华又焕然一新，几乎难寻旧迹了，但是在我心中，清华的记忆像校花紫荆，红紫芳菲，永不褪色。

我爱清华，我爱清华人。

[原载《清华十二级纪念刊》(1990年)，2017年1月26日经陈舜瑶学长审阅同意刊登。]

怡然自得 天年永寿

——访长寿老人李增德

○熊 蕾

参加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中国代表团工作的前辈，据说仍然健在的只有一位了，他就是现年98岁的李增德老人。李老也是莫斯科会议后成立的中国国际贸促会的首批元老之一。

李老如今和小儿子李斯平一家居住在广州市天河区一个闹中取静的优雅小区。他1961年离开贸促会去安徽财贸学院(今安徽财经大学)任教，一去就是40多年。2004年老伴过世后，李老独自居住在蚌埠。在家人的坚持下，老人才同意搬来广州与小儿子一家同住，至今已有5年。家人说，他目前各项体征指标都还正常，只是有一点白内障，视力有些衰退。

虽已年近百岁，高高瘦瘦的李老依然基本能挺直腰板，每天下楼走走且完全不用拄拐。他说，他在小区里有几个朋友，经常一起“笑谈”世界大事。老人听力甚佳，和他交谈，完全不需要放大声音。他调侃说，这应该得力于当年做翻译，当翻译都需要听力好。老人对50多年前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前一天看了什么文章，看了什么电视节目，也记得清清楚楚。远期和近期记忆都这样清晰，谈话间思维也

很敏捷，完全没有这个年纪的老人常见的那种“车轱辘话来回转”的现象，李老的身心健康显而易见。

知道我们拜访他是为了了解当年莫斯科会议的情况，李老甚至事先手写了一份“备忘录”，从他调到北京参加莫斯科会议筹备，到1951年9月首次经莫斯科去布拉格、哥本哈根参加会前会的经过，以及参加会议的主要人物，都写下来，供我参考。那样的周到和细致，令人非常感动，也可见当年贸促会老前辈的一种严谨精神。

说起老人健康长寿的“秘诀”，老人的儿子李斯平说，李老生活很有规律。他从不抽烟喝酒，每天早上5点多醒来，6点起床。每餐量不多，但是总要有点肉，“无肉不欢”。晚上吃得少些，只是一碗粥，但早上胃口好些，有时吃牛奶，有时吃豆浆，一般都要吃一枚煮鸡蛋。但是所有“秘诀”中，最主要的还是心态平和，他从来不发脾气，也不生气。用李老自己的话说，“生气最不好”。

甚至我们谈到李老1961年离开贸促会，离开北京的缘由，老人都很淡然。他